

小說 第一名 許宸碩

個人簡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宜蘭人，曾任臉書專頁「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小編之一。清大台文所就讀中，論文曾於第十四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發表。曾獲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時報文學獎小品文組、竹塹文學獎小說佳作、月涵文學獎等。作品〈遺毒〉收錄於合集《捷運X殭屍》（海宇出版社，2017）

---

〈孤證〉

致採訪者。

那一天，當你打電話給我，說要找我訪談時，我感到羞恥。如果書寫是一種抵抗，那我連像樣的抵抗都沒做出來。我許多以只出現過一天的筆名在民報上刊出的不怎麼樣的小說，就像我一樣，沒什麼被記憶的資格與價值，只是因為它們在必須被眾人所記憶的場景中偶然出現，我和我的小說便成為研究者在使用放大鏡看著那場合的所有細節時不可被忽略的一部份，而徒增像你這樣的年輕研究者的困擾。只是，時間摧毀過這麼多東西，比如帝國，比如政治強人，卻沒讓我死在南洋或政治；而我的小說，在被排成鉛字，塗上油墨，打印在報紙上，收藏在某小學書館中，歷經風災地震而平安無事，有一天被某研究者拂開灰塵，翻開，雙眼一亮，說東西出土了，成為無法抹滅的史料的那一刻開始，我便對這些文字有了責任。

我不擅長訪談，而那混合北京話、日本話與台語的腔調，你也未必能聽懂。還好，你有著某些年輕人有的謙遜的善意，寄予我資料與問題，並願意讓我用書寫回答你。儘管此時我的任何書寫，都不再具有抵抗意義。

你的問題是：我為什麼寫小說，以及書寫背後受到怎樣的經驗影響。在我回答前，我希望能詢問你一件事：你寫過小說嗎？我說的，不是那種僅僅將自己經歷加上一些變造的現實的贗品，而是虛構一件從未發生的事件，並使人信服。我很久以後才認知到我不再書寫的原因，是因為我錯估了小說的本質。小說是看似真實的虛構，而我明白得太晚了，以致於當我開始學習虛構真實的藝術時，我已經來不及書寫，而最後也無力再書寫了。當然，這和我當初以為的書寫理由，已經相差非常遠了。

正如我慢慢明白虛構本身，我也慢慢明白，虛構與語言的關係。在思考成為語言，提筆寫下文字的那一刻，那不怎麼牢靠的、意義與符號之間的關係，便無可逆轉地造成了虛構的存在；而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我寫下的文字，我唸出的句子，亦將我書寫的理由不斷竄改。於是，當你詢問我為什麼書寫時，我也只能回答，那在一次次的書寫及自我質詢中，不斷被加上虛構部分，直到我自己也察覺到扭曲，而不得不拋棄的初心。

也因此回答是困難的，我不得不面對少年時的青澀、蒼白、單純，以及因此而寫出的那些幼稚粗糙的作品們，而更加意識到，自己並沒資格被你這樣的青年

研究者作為研究對象。然而你是不會因此放過我的，對吧？我想，我也該整理自己，告訴你我曾經以為自己必定奉獻於之的書寫理由，其中的改變，與背後發生的故事。要談決定做某些事情的那一刻，是注定困難而不準確的。人類總是偏好論述頓悟的一刻：在某確切的時刻，迸發一個模糊但具有方向的思想。但那些我們以為在那瞬間做的想法，其實都是在許多考量，與許多選項之中，慢慢浮現出來的。

但你是需要那一刻的，而我想我能給予的，決定書寫的那一刻，是得知先生們被逮捕的那天。

我說的先生們，是蔣渭水、林獻堂、蔡惠如先生這些文化的先生們。有些先生我還在台北時便接觸過；有些則是到東京後，第一次見面，卻受到無比熱情的邀請。他們常來我們宿舍關心我們。當我看著他們的身影，他們想要追求的東西時，我感到疑惑，因為我看到的漢文化，如果用日本學校教的那一套來看，的確是落後的，但我也在日本人這樣的歧視下活得很痛苦。所以我景仰那些先生們，他們似乎有對付這痛苦的解方，但我沒辦法和他們並肩站在一起。因為我的無能，我也不理解，要怎樣才能讓日本人給我們平等。

在那之前我是不參與政治活動的。那並不是出於恐懼或冷感，而純粹是認為自己過於無能與無知。我一開始受的教育是冊房，聽先生們講四書五經，用毛筆寫舊詩，那是父親堅持，即使受了日本統治，還是要學習漢文化，不能讓文化斷在我們這一代手上。後來去日本人開的小學上學後，才對現代知識開了眼界，也才會來日本學醫。後來來到內地，學了一年醫，暑假便回到台灣休息一陣子，即將開學時，我離開台灣，坐上船，準備回學校迎接開學。

靠近東京港時，港口與港邊充滿了木頭殘骸、家具碎片、衣物、器皿，彷彿有大水把岸上的一切捲入海中。當時大家一看到陸地，異樣感便襲向所有人。上岸是很勉強，幾名船員想辦法把水中的垃圾清出個道路後，才讓船得以靠岸，讓我們下船。東京的建築只剩瓦礫與燒焦的木頭殘骸，屍體堆在路面上，僅僅蓋著白布。活著的人們有許多都皮膚焦黑，或全身骯髒地坐在路邊，看起來和死了沒兩樣，只是死狀各有不同。

那是大正 12 年的事情，是我第一次看見地獄的模樣。在我記憶中，這麼可怕的震災只出現過兩次，這是其中一次，另一次在台中，兩次都極其慘烈。地獄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太過可怕，以致於所有我得以用來形容那災難場面的詞彙與句子，皆顯得不足。我再怎麼想盡力對你說，崩塌的瓦礫底下散發的惡臭，漫天飛舞宛若禿鷹的蒼蠅們，我握著手眼睜睜看著斷氣的、被燒到連肌肉都成炭的死者，在長長的隊伍中，等待領取連充飢也不足的食物活人們，救援人員成了收屍人員，將一枚枚的屍體放到推車上，給其他人拉走。那種會讓人麻痺知覺的，無盡的絕望，你還是沒辦法真正體會到的。

後來這場震災被命名為關東大震災。或許命名可以讓人指認該事物，並藉由它所輻射出的許多意義來漸漸接近其中心，但那充其量也只是接近，而無法真正體會到在彼時彼地的受災者的絕望情緒。也是在那樣無法指認的絕望下，你才能

看到大和民族的道貌岸然的面具底下真正的樣貌。這樣的樣貌有好的，比如醫學院的學長們帶著我們，提著手提包，主動來災區義診，我們幫忙換藥與照顧病人；但也有許多災民不按照秩序而搶糧食，官員扣押賑災物資，甚至有人流傳朝鮮人在井水中下毒，結果讓警察與災民們直接對朝鮮人施暴。我看到那樣的景象時相當害怕，要是他們也發現醫師袍底下的我有台灣腔，無法發出一些純正的字音，會不會下一個脖子被綁上繩子，拖在路上磨破身上皮膚，直到被勒死的人，就是我了？

我在那場巨大的災難中學到的，是沒有什麼人比較高級，比較低賤。在惡劣的環境下，受過再好的教育的種族，都只會變成獸。憑什麼這些日本人可以對待台灣人如次等民族，只因為台灣人試圖取得跟他們一樣的平等地位？

回到那天吧。那天是冬天，將近一月的時刻，當時我留學東京習醫。東京的冬天比台北更冷，我們留學生們待在宿舍，煮著火鍋暖和身體。大家都在異鄉，一種同鄉的情感就出來了。吃著火鍋，喝了些清酒，話匣子就打開了。當大家都在聊著些日常的瑣事而大笑時，一個人突然開口了：「你們有聽講先生伊們給人逮捕的消息無？」

氣氛瞬間冷了下來，有人訝異地問：「為什麼？」

「講是因為推動議會期成運動，違反『治安警察法』。」原本的開口者繼續說：「自己訂法律，自己講誰違法，自己逮捕人，總督府真正是台灣的皇帝，幹。」

「伊們憑什麼逮捕人？日本人是比台灣人高級喔！」

當我開口的瞬間，大家訝異地看向我，隨即給了我掌聲。

我一時不明所以，直到又有人開口：「對啦！伊們本來就講白賊，講台灣人恰日本人攏是天皇的子民，地位平等，什麼時陣有這回事？」

我才明白為什麼我會得到掌聲。那瞬間，我才終於能理解那些先生們在做的是什麼，而隱隱地想要去參與。

我需要某種工具，讓我即使在東京，也能和先生們站在一起，對抗島嶼上的不義。

我選擇文字有很多原因，一開始當然是因為距離，再來是因為懦弱。

一開始，我知道人在內地的我，只有透過書寫與投稿，才有辦法與台灣的島上的人互動。只是，我並不知道要書寫什麼，以及如何書寫，用一個更準確的講法，當時的我對小說一無所知。在醫學課業的空檔中，我漸漸花更多時間浸泡在圖書館中，啃噬中學時讀過的書目。以前台北中學校的規矩是，做為台灣最好的中學，學長們會要求你必須看完許多「必讀之作」，如果連杜斯妥也夫斯基或夏目漱石都沒讀過，即使你拿到那張畢業證書，他們也不承認你是他們的學弟。然而，蒼白無知的少年，又怎麼有辦法去理解這些作品，以及背後那巨大時代的幽微情感？當我重讀時，我才慢慢發現自己被這些作品吸引進去，我看懂康拉德筆下的黑暗如何吞噬人心，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罪人與信仰，也在讀民報時看到了魯迅，而訝異他把舊中國的陋俗與黑暗寫得如此觸目驚心又刺痛人，傳統國學面對現實的無力。

在成為一名好的小說家前，要先做的是成為好的讀者。我虔誠地閱讀他們的作品，偷取他們的技藝，吸收他們的內涵。技藝可以學習，但內涵沒辦法速成。內涵必須經由經驗的吸收，與知識的增長，才能慢慢成長。正巧那時有其他留學生開讀書會，我自然也參加了。直到過去以後，才發現他們讀的是社會科學的書籍，還有人帶了德語版的《資本論》的相關批評。《資本論》雖然有日語版，但相關批評卻沒有，結果就是他們仰賴我幫他們將那些文章翻成日語。

正如我早先對日本的憤怒，讀了左派理論的少年們，總會對這世界有憤怒與疑惑，憑什麼那些資本家可以壓榨身無分文的農民、工人們，不給予合理的薪水，讓他們世世代代脫離不了貧窮？在當時，閱讀這些理論是摩登的，也是危險的。一群人偷偷做著有點危險的事情，相信你也知道效果會如何。我和他們混得非常熟，也因此知道有幾個人之後也想寫作，使我也開始動筆起來。

第一篇小說，是寫一名農民家裡的地被徵收，成為糖廠的蔗農後，被糖廠壓榨的故事。我將自己寫的小說給了幾位同鄉看，得到他們大力的讚賞，以及一些基本的修改意見。然而，當我修改完畢，自信滿滿地將稿子投去民報後，得到的卻是退稿信。信上用我看習慣的、醫師的草寫字寫下退稿理由，信末屬名懶雲。基本上信件內容說明這篇小說故事結構淺薄，不貼合真實，給了些修改的建議，也用鉛筆將有問題的字句逐字修整。

我對於不貼合真實這點相當訝異，我的意思是，我以為我寫出的是人民的苦痛，但懶雲在信件中直接寫到他周圍的情況是如何，糖廠、蔗田與農民怎樣互動。他寫下：「日本人不曉我們情況，必然亂寫；但你是台灣人，應知台灣情況，依實據刊，才能呈現台灣人民真實苦痛。」

看完後，我呆然好一陣子，一股深深的後悔感襲向我。我欽佩懶雲先生犀利的雙眼。現在想來，或許是因為那篇作品實在太差勁了，所以一開始就露出馬腳。故事裡的梗概事實上我全都是聽讀書會的其他人口述的，但能來內地唸書的人，怎麼可能會知道下層同胞的真正情形？而身為商人之子的我，除了過年時聽到部分我曾最鄙視的親戚們的口述，又怎麼會知道身為農民或工人的辛苦？以前讀的那些關於剩餘價值、分配、生產工具的理論，那些我曾經視之為信仰的，在那一刻便褪下光環了。我看到理論背後那望著巨大的世界的苦痛的眼，在望向我，也望向我背後的帝國與殖民地。那才是我該做的。去直視那些我想像的痛苦，看清他們的真正樣貌。如此，當將它們寫出來時，才會如此刺痛自己，也刺痛他人。那是我第一次認知到小說是怎樣的文類，至少，在懶雲先生心中，是怎樣的模樣與地位。依著懶雲先生的建議，我試著修改自己的小說，卻成不了事。最後我將筆暫時擱置。一擱置，就到了回台後。

其實回台後，我原本是可以參與第一線的社會運動的，只是說到最後，我還是因為懦弱，到最後仍只敢以文字為武器。雖然到最後，也已經沒有人有辦法走上街頭，而只能靠文字抵抗暴政了。

在我回台前的那一年，我曾經在街頭上遊行過，是和朝鮮人一同抗爭要求他們的權利，是我這一生中唯一參與的遊行。遊行隊伍前進不久，便遇到警方，整

個隊伍自然是被阻擋下來，且很快就被強制遣散了。

所謂的強制，是大人們的棍子與手銬。我看見他們的棍棒毫不猶豫掃過朝鮮人的臉孔。原本舉著日語標語、喊著日語口號的朝鮮人，有些人喊著：「住手！沒犯法！」有些人痛苦地喊著我聽不懂的朝鮮語，滿臉是血在地上爬著。在那瞬間，我的腦袋是一片空白的，直到我也被上了手銬，帶到附近一間派出所為止。

我只過了一天，就很快被其他同為學醫的、且同為讀書會成員的本島人學弟帶出派出所了。出來時，學弟還嘖嘖稱奇，說我怎麼一點傷也沒有。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身上一點傷都沒有，或許是因為我當時在那場景毫無反抗，就只是呆然站在那吧。但那幾天後，我每次看到警察，都會無意識打冷顫，背脊發涼，深怕我突然就被壓制在地上，被警棍打頭，然後被拖回派出所。我想那時我還是有受傷的，只是受傷的是心，憤怒被一種更巨大的暴力壓制。一旦憤怒，就會被制約地想到暴力，於是就再也無法憤怒了。

我訝異的是，那可是在內地。

在殖民地地上，被殖民的人民被魚肉，是悲哀地天經地義且難以抵抗的，那是我從一開始就知道的事實。但連在內地，政府也對反對者毫不顧忌地施加暴力。到那一刻，我才領悟到，日本政府不只是殖民者，且無論對內對外，都是獨裁者，說的一切都只是理念，但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

帝國是擅長說謊的。

在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參與政治遊行了，將自己退縮在文字的世界中。即使如此，每次在民報上看著自己的小說刊出時，我總是會害怕哪天突然有大人上門，不說原因，將我突然帶走。我是抱持著那樣的恐懼，在書寫小說的。

回台後，我在台北 XX 町上開了一間病院。醫生這職業要看的是病人，而生病的人是無分貴賤的。我看過一位有錢的老人，家裡爭權奪利，大家都在想著要搶他的遺產，只有一位真心愛著他的女兒聘了我過去治病；我也看過許多貧困的農民，只為了要治好親人的麻拉利亞或肺炎，請我提著醫藥包過去，並苦苦哀求他們沒錢，能否寫借據給我，以後有錢一定還。

以前我是寫了借據，但也就放著而已，我知道在帝國的結構下他們很難翻身，所以也不求這些錢的回報。後來，我才發覺我可以要求一些錢以外的東西，比如在他們家借宿一晚，和他們詢問生病前後的故事。聽了許多故事後，我才覺得，自己慢慢有辦法去動筆寫他們了。

那是台灣最絕望的年代，文協因為左傾而被總督府盯上，掃蕩，消失，我曾參加過的讀書會的學長姐學弟妹們也一批批被逮捕。當他們出獄後，曾經的勞動組合，農民組合，早就消失殆盡；但那也是臺灣文學最意氣風發的年代，當時曾參與讀書會的少年之一楊達寫了篇〈新聞配達夫〉拿到了東京《文學評論》二獎，且首獎從缺。那可是日本第一流的雜誌啊！之後還結成了台灣文藝聯盟，辦了《台灣文藝》月刊。大概是他們也和我一樣，逃避到文字的世界，只為求最後的、最微弱的抵抗吧。

我當時發表的那些小說你大概也看過了吧。當然，現在要我重讀那些作品，

我大概也只能苦笑。並不是說寫得好或不好，我很清楚，它們之所以還能有一點價值，絕不是因為美，而僅僅是因為時間沒摧毀它們，讓它們還有那麼點展示當時的人的思想的功能。但我當時確切地相信，小說必然要書寫真實，而那些小說中還蘊含著我當時的真心。

後來就戰爭了。戰爭的那一刻起，《台灣文藝》就停辦了，楊逵自己辦的《台灣新文學》不久也停了。或許你會以為那時的問題是沒有地方可以發表文字，這的確是問題，但更可怕的是這些文學雜誌的停刊，代表總督府不同意我們可以說這些話。我曾經以為書寫真實就能對抗霸權的理念，被霸權的真實擊碎得一乾二淨。

我什麼也不剩了，所以什麼也寫不出來了。

之後，當聽聞《文藝台灣》誕生時，我感到訝異，沒想到在現在這時局，還有人做文藝雜誌。買了幾期來看，裡面的小說讓我訝異。在那之前，我從來沒看過在台日人寫的小說，尤其是西川滿。我被他所深深震撼了。原來即使生於這座島，有些東西我還是不知道的，而他卻不知道從哪來找到這麼多台灣過去的紀錄，將之寫成小說。即使我不認同裡面的美學，我甚至對於他對歷史的改寫感到惱怒，卻也不得不承認這是聰明的作法。

是在閱讀他的作品後，我才察覺到小說裡虛構的存在的。面對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會看到不同的真理，或者，為了使真理成為真理，而不得不使矛盾之處隱藏，邏輯不足之處加以虛構。此時，我重看過去自己寫的的那些小說，才發現我寫的那些真實，其實仍然只是建基在被我書寫的可憐人的真實的虛構，只是那些虛構恰恰有辦法說服我們那一代人的知識份子。

我重新回到那個什麼都不懂的少年時代，構思那些我沒見過的情景，閱讀相關的題材。但我還沒寫一個字，就被徵召到南洋了。說是徵召，但總督府官方的說法叫志願兵，只是那種志願，是警察帶著志願單跑來你家，腰上插著武士刀要你簽名讓他們數據好看一點的志願。最後我被抽中，而去了南洋。

往南洋的船在高雄港出發。妻子牽著孩子，只能送我到火車站。我望向熟悉的台北城離我漸漸遠去，祈求她替我求的香符真有保佑的功效。

一開始，在馬來亞的生活其實是相當好的。日本人比台灣人高級，台灣人又比當地的土著高級。我在那裡當著醫官，定時寄錢回家。我們只會、也只能是罪人，驅逐了歐米的殖民者，變成我們自己來殖民他們。我無法求自己的心安，但若抵抗帝國的共犯結構，那死的就是我。我別無所求，僅僅希望好好活著。

後來，局勢開始轉壞，盟軍打了過來，直到最後，我們逃入叢林。我只能在臨時搭建的帳棚內為病人治病。生病與死亡是不分種族與國界的。無論是金髮挺鼻的俘虜、當地的土人，我的台灣人同鄉或日本人，他們有些死於水土不服的痢疾，有些人死於叢林中槍戰的傷口感染，有些人死於麻拉利亞或其他傳染病，有些人死於被虐待。而我做為醫生，卻因為藥物的缺乏，而只能看著他們一個個死去，然後與其他活著的人在營區附近挖坑，將死者一一埋入。只有此時，我才能感受到大日本帝國的公平，無論日本人台灣人高砂人當地土人金髮碧眼的西方人，

大家都是不分次序被埋入坑中，不會因為是日本人就埋比較裡面或最後才埋。因為我們早已無力區分高低。有一些台灣人同鄉在死前交代我，希望我能將他們的骨灰帶回家鄉。但在那樣的時節，我們沒有足夠的燃油將遺體燒成灰，夜晚也禁止生火，以免被敵人發現位置。我能做的，僅僅是剪下他們的頭髮與指甲，裝入那些藥物早已用光的藥瓶，上面標記名字與地址。如果能活著回到台灣，就把他們的死的剩餘交還給他們的家人。

有一晚，我不怎麼好入眠，可能是因為悶熱的天氣，蚊蟲的飛聲，壓力的累積或某些我早已遺忘的理由，我決定起身走走。走過病人們所在的臨時床鋪，出來帳棚，營區在月色照耀之下，比想像中明亮一些。我不敢離開營區，就待在原地，呼吸著叢林中特有的夜晚的涼氣，感覺全身靜謐。

然後聽到了奇特的聲響。

那是咀嚼聲，咀嚼著含水分的強韌的物體，不時爆出骨頭碎裂的細微聲響。我剎時清醒，畢竟那是叢林，若周遭突然有凶猛的食肉動物襲來，可能大家都會死。我安靜地回到帳棚，拿起手槍，上膛，出帳棚後，緩慢離開營區，槍口不斷對準前方，就怕隨時有什麼東西會從密林中竄出。前進的方向是我所熟悉的，那是前幾天我們埋屍體的位置。

很快地，我便看到聲音的來源。是上等兵野口。當然此時在這裡寫出他的名字並不會讓你對他有任何瞭解，而我也同樣不瞭解野口。他似乎是為了逃離家鄉，而志願從軍的，絕口不提過去。大家一開始對他還有些同情，最後因他個性孤僻，當同情被消耗殆盡後，便只剩冷漠了。我看見飢瘦的野口坐在前幾天蓋著薄土的埋屍處旁，一個黑髮黑皮膚的當地的土人屍體躺在他旁邊，四肢已被切下。埋屍處已經被挖出一個洞，一旁是覆蓋土塵的刺刀，上面還有血跡。

他正在吃那屍體。

我緊閉著唇，仍能感受到直竄咽喉的酸意。我趕緊離開那地方，回到營區，便到設來當臨時廁所的小坑大吐特吐。由於好幾天沒辦法好好吃東西的關係，吐出來的酸液似乎特別濃，使我咽喉灼熱許久。吐完後，我覺得很冷，便回到帳棚內，飲了點水漱口，躺回床上。我不確定在我一生之中看過的可怕的場景能怎麼排名，但讓我對人類這概念開始崩解的，大概就是這一場。即使我早已不相信帝國的謊言，我周遭的內地人，甚至是一些本島人，他們仍相信著大東亞共榮圈，相信自己該從歐米白人的手上解放亞洲被殖民者。那才是虛構的極致，讓人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真的，直到自己崩壞為止。

我當時第一次知道人竟然可以為了謊言而讓真正的自己崩毀如此。

知道帝國投降，並不是因為天皇玉音，而是米軍的軍機投下的傳單。當兵長看完後，他沉默許久，最後給了我們兩個選擇：為帝國而死，或活下去告訴眾人一切。大家都哭了。部隊裡準備了一種膠囊，裡面放著毒物，是讓我們被俘虜時，可以含下去自盡的。所有還對帝國有帝國虛構的夢想的人們，不分台日，將夢想化為那一顆顆的膠囊，吞入口中。我救不了他們，他們沉溺於自己的夢想而死，這或許對他們而言是最好的結局。在俘虜營中，我知道台灣往後將變成中國的一

部份，俘虜營裡也有老師開始教我們中文，寫國歌，寫國父遺訓。我沒有感到欣喜，也沒有感到絕望，而僅僅是麻痺。

回到台北已經是隔年的事情了。到台北後，我才知道，原來台北前一年歷經一次空襲，醫院與小吃攤在那時就被炸毀了。只能慶幸妻子與孩子們早就避居山上，平安無事。

我沒有選擇做兵長所說的，「告訴眾人一切」，事實上，我沒有再寫任何小說了。我害怕起虛構，卻也更害怕自己以為寫下的真實，其實是虛構。正如我不信回歸祖國，台灣就能好一些，而其他眾人多的夢碎也不曾發生在我的身上。說到底，我終究拋棄了一切信念，只求普通的醫師生活，顧好家庭，只求好好活著而已。

我想，這樣的我並不值得你的記憶。你要的某種作者的高尚情操，關於研究的確切答案，那些在我身上都不復存在。事到如今，我離那些事物太遠了，除了歲月沒有摧毀的，得以成為文本的東西，沒有其他人可以佐證我告訴你的一切。即使是寫給你的這封回信，我都無法確認那些自己曾經信念過的理念，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事件，會不會在化為文字時，又參入了虛構的成分，一如小說家會做的，只為了某種前後呼應的合理解釋。

那都僅僅是我的孤證。

我是第 35 屆的小說首獎得獎人許宸碩，希望能請你們協助在中興湖文學獎的作品上註記。

我這篇小說在台籍日本兵的劇情部分基本上是參考李璐《南十字星》劇本，自己收集史料部分較少，但這部分我並沒有給予相對的 credit 給李璐。最近想到這件事情，希望能請你們在上傳網頁的 PDF 檔文末寫「台籍日本兵部分，有參考李璐《南十字星》劇本」字樣，感謝。

**(本文台籍日本兵部分，有參考李璐《南十字星》劇本。)**